

创造还是约束

——海德格尔与艾柯阐释观比较研究

□董丽云 [集美大学 厦门 361021]

[摘要] 阐释学诞生以来主要沿着两条相反的路径发展: 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阐释路径, 导致了阐释的约束性和创造性的“二元对立”。海德格尔与艾柯同为现当代伟大的阐释学家, 尽管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哲学观基础迥异, 但二者皆为消解阐释思想中“二元对立”的关键人物, 体现在对阐释的创造性与约束性上有交集之处, 即生活世界与文化世界是阐释创造性的根本原因; 存在与文本意图体现了阐释的约束性。但是二者的阐释学却均未摆脱神秘主义的影响, 未从根本上解决创造与约束的二元对立问题。

[关键词] 创造; 约束; 生活世界与文化世界; 存在与文本意图; 神秘主义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0)05-0083-05

大致说来, 阐释学思想可以分为理性主义阐释学派与非理性主义阐释学派, 这两个学派的思想分歧集中表现在阐释是约束还是创造的二元对立之上。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 许多当代阐释学家都致力于消除这种二元对立。其中如海德格尔首次提出了“前理解结构”: 每一个阐释者都是带着时代烙印进入文本世界的, 正是这一历史印记才使得阐释得以可能。为此, 阐释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因人而异的。在一个阐释约束性备受推崇的年代, 这一概念的提出足以说明阐释不可能是一个只有约束的过程, 而是一个既有约束又有创造的过程, 这使海德格尔成为消解传统“二元对立”阐释观的划时代者。而时隔半个世纪, 阐释学的发展似乎走向了历史的另一个极端, 尤其是在后现代思想充斥的当代, 阐释的创造性发挥到了极致。为此, 艾柯于1991年在主题为“阐释与过度阐释”的辩论中提出阐释虽然是开放的, 但也是有限度的, 而非无限衍义。这一观点引起了学术界长时间的关注和讨论。

由于二者所处时代不同, 阐释学也根源于不同的哲学根基, 因此在消除创造与约束的二元对立努力的方向上大相径庭。在二者的阐释学观点上, 一个强调了阐释的创造性, 而另一个则强调了阐释的

约束性, 似乎并无交集之处。海德格尔从存在主义阐释学角度论述了在世之在, 从现象学角度去探讨艺术作品中的真理显现; 艾柯则主要从符号学角度强调了文本阐释的创造性和约束性。然而, 尽管二者的阐释学思想貌似异质, 但却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即艾柯与海德格尔研究的目的和面临的局面却是相同的——皆为消解阐释中的二元对立, 提倡阐释是既有约束又有创造的。因此, 通过将二者的阐释哲学思想加以细致比较, 了解二者在阐释的创造与约束思想上的共识与差异, 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二者的阐释哲学观, 把握阐释的意义与界限。通过对二者的阐释观的比较研究, 由点及面, 在此基础上探讨存在主义阐释学、现象学阐释学及结构主义符号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从而对传统西方阐释学与西文现代阐释学的这一重要思想形态与发展有更为全面的了解。

一、阐释的创造性: 生活世界与文化世界

如何阐释? 阐释是否有界限? 海德格尔要回答的是传统阐释学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即阐释的创造性与约束性问题, 或者说是所谓的阐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阐释的趋同性与创造性以及意义的多元性

[收稿日期] 2009-10-19

[基金项目] 系作者主持的2010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限度与界线——语义与语用维度下的文本阐释约束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董丽云(1978-)女, 语言学博士,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与确定性的“解释学冲突”难题。在海德格尔以前的阐释学思想中,由于受阐释学自身历史及自然科学的影响,强调的是阐释的客观性与确定性,否认阐释主体的创造性与能动性。而海德格尔继受以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为哲学基础的阐释学后,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在生活世界与此在的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了阐释的创造性。

“此在”被海德格尔认为是阐释创造性的来源与本基。什么是“此在”呢?通俗地说,此在就是作为特殊的存在者的人。此在的特殊性表现在此在是其本身的意义和一切其他存在者意义通达的窗口。同时,此在表明了此时此地在世、自我显现等意思^{[1]149}。海德格尔认为,此在以及其他的存在者皆为在世之在。此在和其他的存在者的意义并不是像胡塞尔所认为的那样,是通过先验主观性的构成性自我展露而进入先验主观性的,而是在此在的理解活动中被设置,即只有通过此在的理解活动,此在和其他存在者的意义才可通达,此在和其他存在者才真正存在。正是在这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阐释学开启了本体论阐释学的维度。海德格尔的本体论阐释学认为理解是人的根本活动,理解不只是个认识论的问题,更是个本体论的问题——只要此在存在着,此在总是理解着,此在以理解的方式存在着。

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理解是意向性的。意向性结构不是像胡塞尔认为的那样是纯粹意识的结构,而是源于人的生存和生活结构,也就是说理解作为此在的本体活动是来源于人的生活世界。为此,海德格尔提出,此在永远是在世之在,“在世之在的事实性比人类意识和人类知识更为根本的东西。”^[2]这是因为“人们关注的、以及如何关注的事物,从根本上说,是与他的生活和生存方式相关的事物。人的生活或生存状态是一切意义和形式的唯一的、最终的来源。”^[3]不难看出,在世之在是一种一元性的关联,不同于一个存在者在另一个存在者之中的空间性关联,如水在杯子之中,衣服在柜子之中等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之中’不意味着现成的东西在空间上‘一个在一个之中’;就原始的意义而论,‘之中’也根本不意味着上述方式的空间关系。……等于是说,我居住于世界,我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而依寓之。”^{[4]67}

总之,此在的根本活动是理解活动,这一活动植根于生活世界,换句话说,人们的一切理解现象以及一切意义的发生,都是根源于人的生活。相反,此在的纯粹化、孤立化是不可能的,毕竟任何先验的自我、绝对精神等都预设了主体的存在,因为任

何精神上的“绝对”理念都是以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存在经历为理解前提的,所以此在的在世之在是更为原始性的存在,此在的根本活动——理解活动是根源于生活世界的。因此,正由于生活世界的多样性,从而也决定了阐释的多样性,决定了阐释主体在阐释活动中的创造性与能动性。

的确,作为此在的根本活动——文本的意义,并不是束之于高高精神殿堂之上的,而是来源于生活世界,更确切地说,是来自人们生活的文化世界。正像结构主义文化符号学的代表人物艾柯所持有的那样,不拘一格、异类杂陈、兼收并蓄的文化世界才是文本意义的真正根源。上个世纪60年代,艾柯对以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结构主义的“固定文本观”发难,指出文本的信息是一个由不同层次信息组成的网络,各依存于不同的文化代码,在不同意指层次上起作用^{[5]441-443}。为此,文本意义不可能是固定的、一层不变的,而是不断向外、向主体敞开、开放的,因而文本的阐释也必然体现着阐释的主体性,具有创造性的可能。

艾柯这一观点主要源于他的结构主义文化符号学观。尽管他被称为与罗兰·巴特齐名的最伟大的结构主义文化符号学家之一,但是艾柯与结构主义的“文本之外无他物”的文本观还是相去甚远。自1964年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一书发表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得以扩展,引起了大部分人文科学中观察问题角度的深刻变化。首先,从这一角度出发,观察事物就再也不是收集可以试验印证的资料问题,而是意味着把一切表达形式都看成是符号,而这些符号的意义取决于惯例、关系和系统,而不取决于任何内在的特性^[6]。其次,罗兰·巴特明确地指出,语言与文化一样,总是由符号组成的,其结构和组织形式与文化本身的结构和组织形式是一样的。为此,文本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和文化活动一样,可以用符号学的原理来进行分析。艾柯作为结构主义文化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充分地享有这一观点。艾柯把整个文化世界看成是一个差异的符号世界,而语言与这一世界是同构的。为此,文本阐释必然与整个文化世界是休戚相关的,或者说,文化世界是文本意义的来源。

除了对罗兰·巴特符号学的注重和借重之外,艾柯构筑和发展了自己的结构主义文化符号学理论王国。罗兰·巴特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梳理结构主义文化符号学的各流派观点不同之上,艾柯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符号的引申义上,这就意味着他的结构主义文化符号学把研究重点放在外部文化世界,而不是封闭的内部符号系统。确切地说,艾柯

的结构主义文化符号学思想可以被称作文化惯约语义论,因为它强调了文化代码对语词意义的支配性,也就是说,一切符号包括语言符号的意义,都应归之于文化世界惯约。因此,语义的分析问题不得不越出语言内部范围,诉诸于文化环境。语词意义只是一种“文化单元”,确定此文化单元的语义环境和系统是离不开社会文化本身,例如记号载体“狗”的内容是某一意素“狗”,它与某一文化语义学系统中的其他意素对立,正是在不同的文化语义系统中与不同的意素对立,记号“狗”意义得到相对确定,这些外部文化系统可以是动物系统,可以是生命系统,还可以是哺乳类系统,这就使语词意义确定问题与外部文化世界相联系^{[5]304}。记号的语义就是由这些位置构成的,艾柯称此为“百科全书式”的语义分析法,因为记号的意素单元是在整个文化世界中得到相对确定,这个文化世界通过代码对某一记号进行多层次、多系统磁化、定位的。

在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艾柯强调整个文化世界为文本意义的动力因,文本意义是外部世界投射的结果。比较而言,尽管海德格尔与艾柯的哲学观基础不一样,但是在文本意义的本源和原动力等问题上持有类似的观点,即人类生活的外部文化世界是文本意义的根源。正像艾柯一样,海德格尔认为对文本阐释是此在在在之在的结果:此在及其他存在物者的意义是在此在的本体活动——理解活动中展现,而这一活动根源于此在的文化生活世界。

二、阐释的约束性:存在与文本意图

读者在阐释中的作用不能够被过度强调,阐释的约束性与边界性是不容忽视的,否则阐释中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会被无限放大,甚至把阐释看成是读者独立的行为,以至于武断地认为文本是无依无傍的。把阐释的决策权交给读者,文本阐释的约束等于陷入虚无。“想怎么阐释都行”这一主观臆断的阐释行为与作者意图论者的独断专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阐释是有约束性的,也就是说阐释是有界限的,这种界限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存在”,在艾柯那里则是“文本意图”。

虽然海德格尔认为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阐释的创造性,但他同时也认为阐释是具有结构性与边界性的。什么决定了阐释的边界呢?海德格尔认为就是“存在”。前期的海德格尔主要研究此在的活动,后期的海德格尔转移了研究的重心。1936年,海德格尔作了一个关于艺术作品起源的学术报告,对人的生存的研究转向了对艺术作品的研究,提

出作品的意义和真理就是在作品中展现的“存在”^{[1]142-143}。存在是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中的关键词。海德格尔认为,以往的形而上学更多关注的是存在者,而非存在。那存在是什么?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存在问题不仅尚无答案,而且甚至这个问题本身还是模糊和没有方向的。”^{[4]34}正像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中的“道”一样,存在本身是不可说明的。存在是最一般的、不可定义的自明性定义。那么,存在栖居何处?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存在居住于语词之中。

既然存在栖居在语词之中,存在又是不可定义的,那么存在如何在语词中显现呢?海德格尔从词源学上探究了“现象学”的哲学意蕴。“现象”就是“显示自身的东西,显现的东西或开启的东西”;逻各斯在希腊文中本有多种意义,如理性、语言、规律等,海德格尔认为,逻各斯最重要的意义是语言活动。逻各斯作为讲话或言谈,其意义就是把讲话或言谈中所涉及的东西公布出来或昭示出来。因此,由“现象”和“逻各斯”所组成的“现象学”一词的意思就是让人从言谈中看到事物如其所是那样显示自身,昭示自身——言谈使真理得以被揭示。正如“农夫的鞋”这幅油画通过此在的欣赏活动才能向外部世界无限地敞开,否则它只是一双鞋,因此,每一部作品的存在是通过此在的理解活动而不断被揭示其本真状态,从而进入无蔽的敞开状态。同时,海德格尔指出,存在是存在物有限度的原因,因为存在是存在物相区别的根本原因。因此,阐释是存在的阐释。

艾柯认为阐释的边界在于“文本意图”。虽然艾柯没有像海德格尔一样把艺术作品存在的显现和探寻看作是林中路,但是他做了一个类似的比喻,把对作品的阐释看作是“悠游丛林”,而把作品独一无二的存在作为文本意图。丛林是艾柯对叙事性文本的一个隐喻。艾柯对文本的丛林有着这样的解释:丛林是小径分岔的花园。即使其中没有一条是已经被人走出来的大路,每个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步子前进,可以自己决定是走树的左边还是右边,并且每次碰到树的时候,都拥有做出决定的自由^{[7]7}。同样,在文本的丛林里,读者有着自己的阐释。在一些先锋派作者“恶意”编制的“文本丛林”里,往往打破读者的平常期待,读者有时很难逃出来;也有一些读者根本不想走出这个丛林,因为他们想尽情地在文本的丛林里畅游。

艾柯本人正是这样一位丛林的编制者。在其成名作《玫瑰之名》中,与其说是一部悬念迭起的侦探小说,不如说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知识游戏丛林,

因为在这篇小说里,被选择的读者在这里尽情地畅游,是需要一定智慧的。这不仅不是一部马上说读完就能够读完的小说,而且还需要具有符号学、历史学、宗教、版本学、文艺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知识才能阅读下去,否则,即使读者精疲力竭也不一定能够走出这个丛林。

诚然,在文本的丛林里,读者可以畅游——做出各种各样的、甚至是怪诞的阐释,因为“经验读者可以从任何角度去阅读,没有条例能规定他们怎么读,他们通常都拿文本作容器来储藏自己文本以外的情感,而阅读中又经常会因势利导地产生脱离文本的内容。”^[7]然而,艾柯提醒读者,虽然我们无法断定哪一种阐释是最佳的,唯一可以断定的是某一些阐释比另外一些阐释更加的合理^[7],这一点至少可以说明阐释是有限的。为了进一步论述他的观点,艾柯提出,可以“根据文本的连贯性及其原初意义生成系统来判断,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是否就是文本接受者根据自身的期待系统而发现的东西”^[8],这就是所谓的“文本意图”。简而言之,文本意图是通过“文本应该被阅读的方式去阅读文本”而获得,除此之外,它之所以成为文本阐释的约束因素,主要因为“文本中作者‘潜意识’甚至‘集体/个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阅读中读者主体意识的自由介入分别对作者意图和读者意向构成了干扰因素,而文本的稳定状态决定了文本意图的可靠性,使之成为给作品定性的唯一标准。”^[9]

三、无法阐释:类神秘主义情结

到此为止,似乎海德格尔与艾柯均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阐释学的经典难题。但是,由于阐释创造性与约束性本身的界限难以把握,以至于二者的阐释学思想在本质上均显现出类神秘主义的倾向。

《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中,艾柯曾把所有的阐释路径分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个派别,并且认为这两个阐释派别,尤其是非理性主义阐释派与神秘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海德格尔的阐释思想也被艾柯归于非理性主义阐释派。

海德格尔因“存在”之说被许多学者称为神秘主义者。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存在是语言交谈的单一指涉,否则语言是无法交流的,因此存在必然是超乎语言之上的东西,海德格尔将其称为“恒常之物”、“永恒常存者”、“神址”等。为此,有些学者认为,海德格尔“这种现代神秘主义的根本态度在于:它不满足于‘昙花一现’的‘存在物’,而要人们去‘神思’那‘恒常之物’——存

在。”^[10]

虽然艾柯把海德格尔称为神秘主义,但艾柯本人也难逃神秘主义的纠缠。与海德格尔的“大无边的神圣之物”的神秘主义相比,艾柯的神秘主义倾向显得与现实世界更为紧密。艾柯的文本阐释具有创造性的这一思想是源于其结构主义文化符号学家的背景。在文化符号学体系中,艾柯提出符号的创造性在于“无限的符号过程”。艾柯的符号过程理论的基本内容是解释项和试推法,二者是实现符号无限化的有效工具。解释项相当于整个记号载体的直接意指和引申意指的领域^[5]⁵³³。简单地说,解释项就是引申义。解释项的无限符号过程遵循的是试推法。艾柯的试推法依据的是文化约定,与逻辑推理无关,这成为了艾柯无限符号过程的核心。

虽然作为自己的有关著作的经验读者,也许艾柯害怕与神秘主义扯上什么关系,我们深感到艾柯在苦口婆心地在阐释“标准读者”以及文本意图是什么,但是在阅读过程中,按照艾柯对文本意图的定义,谁又能够确信自己的阐释是符合文本意图?难道仅凭“文本应该被阅读的方式去阅读文本”就能够通达文本意图吗?艾柯对此的论述始终让人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如果文本意图是如此定义的,那么人人都可以声称自己发现了文本意图,因为人人都可以说自己按照“文本应该被阅读的方式去阅读文本”。由此,人人都发现了文本意图,而文本意图又是千奇百怪的,它如何能保证文本意图的可靠性?^[11]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文本意图有了海德格尔存在的意味。或许,海德格尔对此的做法更为高明一点,存在本身是不可说明的,说出的存在就不再是未被说出的真。为此,对此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沉默,只有沉默才能显示存在的不可说性。作品的文本意图或者说存在其实是无法定义的,它是在阐释中自动显现的真理,说出的文本意图就不再是文本意图了。而且,艾柯也无法告知如何获得文本意图。尽管艾柯没有像海德格尔之于存在那样,阐明文本意图是在无限敞开的文本阐释中获得,但是这一点可以清楚地从他“丛林”的论述中体会到。

其实,神秘主义表现为对恒常之物的追寻和无穷联系的统一,因为这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是无穷倒退的一个过程。因此,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寻和艾柯的“无限符号过程”二者没有根本的不同,都是类神秘主义的表现。

四、结语

虽然身处不同的历史情境,哲学观基础相异,

主要研究领域迥异,但不管是在世之与结构主义文化符号学观有关也好,还是作品存在之显现与悠游文本的丛林相关也好,还是神秘主义倾向也好,海德格尔与艾柯都表现出相类似的哲学思想高度和见解。正是借助这样一个平台,两位哲学大师隔着学科分界线喊话,犹如进行了一次跨时空、跨语言、跨文化、跨领域的对话,对阐释学的经典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解决思路。

对于海德格尔的在世之在,可以进一步延伸到艾柯所提出的文化世界这个更为鲜活的背景;尽管艾柯在定义文本意图时采用了具体的方法,避免了海德格尔定义存在主义所遇到的麻烦,而艾柯在定义“文本意图”时,却经受着那种不可名状的痛楚,最后也未能达到目的,因此为减轻这种痛楚,借鉴海德格尔对于“存在”的巧妙定义也未尝不可。

阐释不是一个“原文传递”的复制过程,而是一个与生活世界,更确切地说,与文化世界紧密联系的世界。文化世界对于阐释具有本源性的作用。带着来源于文化世界的“前理解结构”的此在的阐释活动,使艺术作品向外部世界不断敞开,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展现自身。存在使艺术作品得到无限生命力,同时使此部艺术作品区别于彼部作品,因为不同作品有不同的存在,有不同的文本意图,从而实现了无限和有限的统一。阐释是思维的建构活动,人的思维因复杂而神秘,但不管有多神秘,阐释活动的有效性应受到语言交往共同体的检验。

参考文献

- [1] 郑涌. 批判哲学与解释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149.
- [2] 洪汉鼎. 诠释学历史与当代发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187-188.
- [3] 章启群. 意义本体论——哲学阐释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27.
- [4]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孙周兴,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67.
- [5] 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441-443.
- [6] 巴尔特. 符号学美学[M]. 董学文,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3.
- [7] 艾柯. 悠游小说林[M]. 俞冰夏,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7.
- [8] 艾柯. 诠释与过度诠释[M]. 王宇根,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89.
- [9] 林斌. 文本“过度阐释”及其历史语境分析——从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反犹倾向”谈起[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4,(4):32-37.
- [10] 毛峰. 神秘主义诗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303.
- [11] 董丽云. 创造与约束——艾柯阐释观研究[J]. 外语学刊. 2008, (1):111.

Creative or Constrictiv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Hermeneutic Ideas between Heidegger and Eco

DONG Li-yun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wo schools of Hermeneutics,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have run counter to each other ever since its birth, which has led to two opposing views on interpretation, they are creative and constrictive. As the two most eminent representatives of Hermeneutics, Heidegger and Eco have shared some views on interpretation, to put creation and constriction on equal footing. Life World and Cultural World is the constant source of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existence and textual intention set 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 still, mysticism in their ideas cast shadow on their original intention to eliminate the conflicts between creation and constriction.

Key words creation; constriction; life world and cultural world; existence and constriction; mysticism.

编辑 刘波